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FOUCAULT
福柯

[美] 艾莉森·利·布朗 著
ALISON LEIGH BROWN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Foucault

福 柯

[美] 艾莉森·利·布朗 著

聂保平 译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Foucault, ISBN 981 - 240 - 781 - 2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美)布朗著;聂保平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 - 101 - 03521 - 3

I . 福… II . ①布…②聂… III . 福柯(1926—1984)
—哲学思想 IV .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5729 号

书 名 福柯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艾莉森·利·布朗

译 者 聂保平

责任编辑 江绪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³/₄ 字数 75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3521 - 3/B · 355

定 价 8.00 元

真理·权力·自我

主要著作

米歇尔·福柯 (Michael Foucault, 1926—1984 年) 首先自描为一位教师。对很多哲学家来说, 哲思的目标是一种不断增长的自我知识; 对福柯来说, 这个目标则一直是改造。更为特别的是, 福柯对成为某种东西的兴趣, 胜于把自己作为各种权力计谋所塑造造成的结果。这意味着, 他必然要从自身出发, 对他所认为的紊乱的真理本质进行详细阐述, 给予它一个更为明晰的轮廓, 并勇敢地与其对抗。

福柯强烈的自我关怀使得他与构成自身的制度、人和观念具有深层联系, 所以, 他的工作呈现出一种“努力在人们的意识中改变点东西”(《自我的技术》, 第 10 页) 的伦理维度。福柯成功地迫使其读者重新审查自己与真理、权力和自我之间的关系。福柯之所以具备教导读者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

在于他拒绝为真理、权力或者自我提供一套普适的模本,在于他坚信人是自由的。

在其后期的一次访谈中,福柯概括自己的目标说:“我所有的分析都反对人类中普遍必然性的观念。这些分析揭示出制度的专制,呈现出我们还可以享受的自由空间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被改变。(《自我的技术》,第 11 页)”这些分析具有这样的效用:在一个没有危险的权欲伴随的世界中强化经验。为了教给学生、读者和自己一种方法,以消解由制度强加给事物的偶然秩序,福柯不得不重新思考哲学实践本身。在那些应用于身体规训的话语和制度化力量的创造之外,不再有概念分析。知识既不是一种抽象的真理,也不是对某些原初现实的一种理解。相反,在反抗权欲的战斗中,作为一种渗透自身及类群的工具,知识是一种进行性的过程。

对福柯来说,权欲是个坏玩意。按他的说法,权欲是一种否定性的态势,这种态势企求统治和愚民,而非开启和赋予生气。运用知识工具不见得就要变为权欲或源自于权欲。正确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行为必然置身某一类群的利益中。为其他与己无关的群体进行政治性思考(此后便是政治性的行动),是难以判明任何当下的形势的。事实上,是权欲给予人们和制度这样的想法:他们能代表别人说话并超越异己。这在福柯著作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监狱改革。福柯在此对政治行为的思考,仅仅是倾听犯人对其所受限制的描述,并同他们讨论权力关系。监狱改革必然从犯人那里开始。但如果监狱改革是为了犯人的利益,那么这个知识进行性过程(监狱改革)就不可能被统治话语所规约。统治话语遭致谴责是由于它只重复着人为建构的秩序范畴,而这些秩序范畴则

伴随被分析的身体的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通过福柯那些雅致而大度的访谈录,每个文本都被详细阐述。而这些访谈是作为一些更具难度的研究的持续评论而发生作用的。福柯思想的入门者会发现,开始阅读福柯的最佳起点正是这些精彩访谈文集集中的某一部。其中,福柯的生活和工作是以如何把自己作为快乐本身来关怀的范例而呈现的,尤其是在反抗权欲的战斗中,除了自我关怀,别无他物。“你知道,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像狗一样地工作——而且终生如此!我对自己正在做的东西的学术地位并不感兴趣,因为我的问题是自我改造”(《政治、哲学与文化》,第14页)。

这种改造是沿着真理、权力和自我的轴进行的。福柯的同事——哲学家吉尔·德鲁兹(Gilles Deleuze)评论说:“有三个维度(知识、权力和自我)是不可约减但却相互蕴涵的。它们是三个‘本体’。可福柯为何又说它们是历史的呢?因为它们并不设定普遍的情境。(《福柯》,第14页)”我们在介绍福柯的文集时,应该记住:对这些概念的分析发生在福柯著作的各个层面。但福柯使用这些概念时并没有厚此薄彼,没有让其中的一个凌驾于其他两个之上,也没有为它们排出特定的座次而使其中的任何一个涵盖另外两个——它们是共时伴生的^①。正是基于这点,福柯把自由作为不容置疑的存在事实提出来,与它们共时作用。因此,我们不得不在特定的处境中对这些概念进行可能的探究。换言之,我们要依据这种语境,并在其中发现这些概念不同的意义来。要成为能进行自我关怀的更为道德的人,我们必须研究真理、权力和自我在处境中运作的方式,也许,这些处境就是自由所在的场景。我们是否有意识地接受这种责任的挑战,对我们的实际责任影响不大。

对福柯而言,思想和行动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由一直在此,而非争得。

在进入本书的主体(第二至五章)前,我将概括出福柯著作的几个主题,并对它们按序略述。福柯的著作大致分成五类:疯狂与理性、经验与知识、过失犯罪与审判权力、性与自我,以及访谈和短论。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任何秩序化都是人为的,我的这种分类也不例外。但愿以上分类范畴对读者选择从何处同福柯一道开始改造的旅程能有所帮助。

疯狂与理性

有四本书可以归入此类,它们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精神病与心理学》、《诊所的诞生——医学诊察的考古学》、《死亡与迷宫——雷蒙·拉塞尔(Raymond Roussel)的世界》。在每本书中,疯癫与理性都交织斗争和展现,以让我们认知到理性与疯狂、可视和盲目以及健康与疾病都是制度的建构,我们的生活经验被强化了。这种认识的结果是一种外在可能,是一种发生在外部的巧妙转变的可能。例如,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论证,疯癫概念的历史分析表明,疯癫本身空无一物。疯癫的症候话语与那些呈现出清晰症候(各个时期的症候变化很大)的疯癫者的关系是,他们被当代以及这个时代占优势地位的理性话语所割裂、展现、扭曲或救治。通过疯癫的无能创造(例如艺术作品的产生),疯癫自身并非种自治的存在物得以说明。但与此同时,没有对疯癫的构造,也就没有艺术可言^②。在福柯看来,当绘画、小说或创作质问标准的经验阐释时,艺术就诞生了。没有疯癫即空无一物的反抗际遇,这种质问是不可能的,这种际遇正是

个体拒绝接受事物秩序的所在。在《诊所的诞生》中，福柯转而关注诊察本身。

福柯提醒我们：“我们被历史地注定去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韧性结构，面对倾听什么是已说的任务。（《诊所的诞生》，第 xvi 页）”医学科学已经调适它所有的课程，察知疾病征兆的各种方式使其自身显现出医者的目光：“症候不再就是说疾病自己的语言，它只是在医疗诊察所提出的问题中确认形式和价值。因此，什么也不能阻止医疗诊察对它的呼唤和构造。它不再由疾病本身所自行规定，而是病理机体和研究方式的会合点。（《诊所的诞生》第 163 页）”正如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说，有一种潜在的现实——人可能生也可能死，而死亡一定会发生。医生运用这些方法可以对生死的可能性作出诊断，而描述这些方法则会把不可见的变成可见的，不可言说变成清晰描述。

在《死亡与迷宫》中，福柯描绘了法国小说家雷蒙·拉塞尔的作品。福柯是在一家书店里整理其他东西的时候，偶然“碰见”雷蒙·拉塞尔。事实上，那天福柯需要拉塞尔小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店员正在忙于招呼其他读者，而福柯却很悠闲，他几乎没做什么，只是浏览而已。后来，他责备自己怎么不知道拉塞尔是何许人。但是，他很快就看完了剩余的内容，并立即着手写作《死亡与迷宫》。拉塞尔小说中要表达的东西，与福柯在“疯癫与理性”系列著作中所要表达的产生共鸣。福柯说：

那就是拉塞尔围绕其无限创作的奇迹有意设置和追溯的界限。一只高卢雄鸡因斑斑血迹而被训练得会创作，或者一个猪油薄饼在标准度量中会吟唱^③ [这就是艺

术法则,参见让·弗雷(Jean Ferry)];头颅变成果酱得以宣告;死亡可以改变。然而所有这些复苏的或被赋予生命的东西的结合都无法返回生活。整个动物生命的秩序可以被超越,一张卜用纸牌上的蛆也能成为音乐家的苏格兰合唱。但是,死永不复生。《《死亡和迷宫》,第85页)如果你愿意将之称为艺术的话,这类强化的经历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我们努力达至某种潜存真理的外部空间,而这种真理将是那些事物无序性的一瞥。死亡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发生;关于死亡的话语将会揭示出一个耐心的话语审察者,揭示出一种历史的观念意识,这必定有助于为自我改造的可能开启空间。发现非理性发生作用的玄秘之所,与强化思想可能性的努力具有同等价值。

经验和知识

不提及著述中经验的首要性,是难以对福柯进行评论的。这些评论涉及到福柯对传统知识体系范围内经验的持续关注。对福柯来说,经验是瞥视话语外部的场所,而且它从这里企图达到某种存在。制度不断重申自己反对这样的企图。如此,哲学立场是要努力从知识向经验转变。

我对福柯著作作了如下分类处理:《知识考古学和关于语言的话语》、《事物的秩序》、《并非烟斗》和《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外向之思》等著作关注的是:什么作为认识论或知识理论而被广泛地阐释。德鲁兹认为,《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此前著作的一首诗”(《福柯》,第27页),而福柯自己则说,他的“目标是要发掘在历史知识领域内发生的历史性转变的原则和结果”(《知识考古学》,第15页)。

福柯认为,一种新历史必须开始;整体史观不再占据着我们的话语结构。福柯重新解释了普遍历史的观念:这种普遍历史着眼于遗忘历史,在制度化的故事处境中阅读它们,以便解释历史并使之更接近于真理。在着手建立这种新历史时,问题凸现了,其中很多是方法性的。福柯如是描述这些问题:

新历史面临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无疑有一些在新历史出现的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但是,新历史聚集它们,并赋予其特征。它们包括文献的连贯和同质的资料体的建构;选择原则的确立;分析标准及其相关因素的确定;某种分析方法的说明;连接材料的群体及其子群体的界定;标识某个类群特征的关系确定。(《知识考古学》,第10—11页)

这些新历史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新哲学的问题。福柯努力处理自己著作中的这些问题,但这可不是个小任务——重新编排没有现成秩序原则的档案材料,它意味着要在无序的历史空间内阅读档案材料并讲述一种新的故事,这种叙述是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说明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但这并不仅仅是以迥异的视点来重构一个新故事。福柯努力的目标在于:通过建构观念起源的历史而重建历史自身的框架。

建立一个选择标准,意味着要引进一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直觉都难以发现的偶然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福柯的重构反对马克思和其他决定论者,他们关于历史事件必然性的理论,似乎并不为人们对于类似处境的多样化反应所支持。他们的叙述细节及其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将由于上述两个方法论上的变化而得到改变。例如,如果反作用是偶然的,那么还原分析将不能被应用。最为重要的是,话语的内涵将按照以

前为人们忽略的方式被重新审视。其结果就是：不管我们是如何擅长设想，历史文本都必须被重新解读。

《事物的秩序》是部雄心勃勃之作。大体上，福柯着眼于知识的三种形式，或者说是西方文化努力认知世界的三种方法。他分析了数学和物理科学、基础科学（包括语言、生物和经济学）以及哲学沉思。在这些认知方式之外的是人文科学，它稍后才存在于这种背景之中。随着知识的基本概念逐渐延伸到“人”的研究，人自身也形成了。“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所展示的，人是近时代的一个发明，并且人也许正走向其终结”（《事物的秩序》，第386页）。福柯并没有说人不存在，而是说，当我们以系统的方式开始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时，我们使之与人性相联的所谓普遍本质的聚合物就凸现在历史中了。这种发明对其所描述的一切是有害的，因为，正如随机分类一样，它所描述的与它所排斥的一样多。随着它的效用日益减弱，并且我们意识到它的危害，“人”也将渐渐消失。

福柯论述经验和知识篇幅较小的著作是《并非烟斗》和《外向之思》，其主题是以绘画和文学的形式描述的。在其他作品中，福柯曾对玛格丽特和布朗肖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帮助他认识外在整体历史与权力知识话语的可能性。他尤其感谢布朗肖，后者促使他明白语言自身有一个外部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将有助于产生关于人的形成及其可能消亡的知识。他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被漠视已久的迷宫边缘：随着主体的消逝，语言的存在仅为呈现自身。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解释这种奇怪关系的入口呢？也许可以通过一种思想的方式，其依然模糊的可能性被西方文化勾勒出边际。一

种主体性之外的思想,从其无边际处设置它的界限,明晰其终点,使其弥漫光芒四射,占据其不可征服的空白。同时,这思想跃跃欲试,不为了获取基础或根据,而为了重获其展开的空间。作为其形式所居有的空间,这个空间到被形式所占据的距离是形式被建构之所到其进入当下存在之地的时空之所,就在这种距离被瞥见的时刻,有一种思想,一种与我们哲学沉思的内在性和知识的肯定性相关的思想,它所建构的,我们也许可名之为“外向之思”。(《外向之思》,第15—16页)

外向之思就是权力之所和现实时空,也是一种经验空间。这里没有直接的外向出口,但我们可以瞥见语言的外部,例如,当创造性的并列朝向其可能性的时候。因此,阅读福柯给玛格丽特画作《并非烟斗》所带来的是对认知者的兴趣,因为烟斗和字母的表征所形成的“并非烟斗”,迫使观赏者从单向表述中回转。

犯罪和审判权力

这个主题下的两本书,其成书过程彼此没有太大的不同,二者目标却并不相似。《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论述的是从酷刑或死刑的公共场景到规训监禁罪犯的历史转变。“我,皮尔内·利维埃(Pierre Riviere),残杀了我的母亲、兄弟和姐妹……”一个19世纪的弑亲案例,在福柯的简短介绍中,由利维埃在狱中的忏悔表述出来。在较早的著作中,我们知道,对一本书的评述需要到经典中寻求一种奇怪的权威。稍后,福柯称之为作者一功能(author-function)。在皮尔内·利维埃的叙说中,伴随的是他的拒绝、略带修饰的恐惧和残忍,或者福柯

的解说。与此同时来阅读《规训与惩罚》，这种介绍似乎要求我们考虑自己同审判权力及其施加于人的规训控制的关系。福柯提醒我们，“在独特的利维埃自传档案上，有一种当下而彻底的缄默继续着”（《我，皮尔内·利维埃》，第 ix 页）。这一缄默津津有味于包围着这一事件公开档案的投圈套游戏（hoop-la），它似乎需要某种对其行动的社会性回应。反之，全景敞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有着清晰的阐释）的权力，连同其全方位观察和不可知的在场这样的双重规训，以一种对过失犯罪的文化回应的方式展现自身，而为了发挥效用，这种权力期候着过失犯罪。也就是说，边沁（Bentham）首创的圆形监狱产生独特的规训控制，在这种圆形监狱的结构里，一个看守就能监视监狱的每个角落。也正是在此刻，犯人们知道它们被监视。然而，由于他们事实上也容易被监视，所以监视根本没必要。事实上，人不可能进行随机和全方位的双重监视。在许多社会人员被监禁的情形下，他们保持缄默。抽象地说，不存在关于监禁的缄默，尤其是当监禁与道德匹配而行时。因此，萦绕着利维埃事件的喧哗和缄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告诉我们：通过权力关系，意义得以产生。福柯说：

皮尔内·利维埃具有无数复杂的好斗动力；他的罪行被记录和谈论，赋予他的死以荣耀；他的叙述因为要导向犯罪被预先准备；他的口头辩解由于疯癫而被认可。其原始叙述的记录斥责并澄清了这个谎言，并召唤死亡的到来。从美好的一面看，在一个文本中，有些内容可被视为理性的证据（这就是判决利维埃死刑的根据），而另一些则是疯癫的符号（这就是为了生命而监禁他的根据）。（《我，皮尔内·利维埃》，第 xi 页）

这是事件文本档案中的利维埃,而文本和事件则导源于医生、律师、法官以及警察。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意义的生产,决定谋杀者的生死以及各种权力斗争。但所有这些与利维埃、他的家庭或者他的可能性没有丝毫关系。福柯既不是要证明利维埃无罪,也不是要通过制度而对他进行判决。福柯的意思是,当所有这些声音被并置在一起时,读者就能明白——对罪行或罪行的处理来说,不存在还原阐释。

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看,《规训与惩罚》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存在于法律的权力之外?”对福柯来说,就是经验和真理。经验是类似于自在求生之欲的东西;真理是知识和权力之欲,这些知识和权力也许会被导向压抑或强化生命的路子。与类似目标相关联的人们,无论是因既定目标,还是因被训导向某个特定目标,都会选择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努力与其他群体并不一致,甚或是争斗。这样既冲突又和谐的目标网络就是经验的结构。在此,不存在正确分类的原始决断,虽然福柯似乎确信这点。例如,哲学化的职责与其说是教化企图,毋宁说是肯定生活。

监禁形成教化生存。从许多角度来看,过失犯罪者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福柯假定监狱改造个体。然而,这一改造不但没有将个体变为建设性的社会成员,相反却促成了一个犯罪网络,这一网络防护了资本利益,却激化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福柯查阅档案的结果表明,监禁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使人更好更道德,但是,“这一工程的失败是迅速的,而且其失败的价值从一开始就被认识到了。监狱远不能把罪犯教化成诚实公民,而仅仅是作为制造新罪犯的场所,并且把罪犯更深深地推向罪恶之域。这点在 1820 年就被认识到了”(《权力与知

识》，第40页）。

揭示这些矛盾，福柯不是要谴责其承制者，而是方法论上的需要。福柯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犯罪化和精神病化感到愤怒，有时候这种愤怒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尽管如此，为了证明这些结构是偶然造成的，必须在其未曾得到充分说明的流变中来解释这些矛盾。这些著作的目标是要改变意识以及相应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类文本带有冷酷的政治色彩。

性与自我

涉及这个主题的是《赫拉克林·巴宾(Herculine Barbin)：最近发现的19世纪法国阴阳人自传》和三卷本的《性史》。福柯的立场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性是一种秘密，一种被迫的忏悔，是人身份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他的关于性的系列论著将性发生的多彩历史展现在医学的和法律的话语中。他对赫拉克林·巴宾自传的简略介绍[同时也涉及到奥斯卡·潘立扎(Oscar Panizza)的一部短篇色情小说和一些关于巴宾的档案材料]清楚地向读者显示出自己关于性的激进立场。

巴宾是个阴阳人，她一出生就被决定是个女孩。她按照女孩的方式生活，成为一个女人。随后，她爱上了一个她想与其结婚的女人。结果，她成了一个男人。他杀死了自己。在他生活的时代，与阴阳人的性别判断相关的个体选择，必须屈从于由官方根据专家的意见所作出的决定。福柯收编这类档案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一种真正的性吗？由于一种近乎顽固的持续性，现代西方文化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一种人们可以想象性的所有价值就是身体的现实和其快感的实现的秩序中，他们倔强地提出了一种‘真正的性’的

问题。《《赫拉克林·巴宾》,第 vii 页)》在西方文化中,一种“真正的性”的代价是沉重的。巴宾这样的极端个案只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它揭示出,在我们坚持根据自己的性别和性进行自我命名的时候,我们已经扭曲了什么。福柯的性政治学导源于在这一领域内他所作出的基本假设。他按照自己的选择研究,但他并不认同制度所遗留的类型——这种类型以牺牲深度的经验和快感为代价来榨取效率和意义。

这里的情形比性别认同和性这两种创造更为复杂——这些创造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控制。真正的性成为讲述关于我们每个人的真理的某种东西。“它是这样两种意识的结合点:一种是我们对自己的性不必自欺;另一种是我们的性蕴涵着什么是我们的最真。这种精神分析已经植根于它的文化精髓中。与此同时,它向我们承诺我们的性,我们真正的性,以及关于我们自身的全部真理,这些真理在性中得到守护”(《赫拉克林·巴宾》,第 xi 页)。如果作为一种性的存在物,我们能理解我们是谁,那么我们也能理解关于自身的真理。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最强有力地反对这种观点。这在第五章中将得到详细阐释。

访谈和短评

在这一简要的概览中,我没有列举这些短评和访谈。除了可以作为研读福柯的捷径外,它们也是福柯的著作、动机和关注面的自我说明。透过这些访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诙谐、睿智、关怀个体的福柯。在本书中,我极为依赖福柯对其文本所做的自我分析。参考书目列出了它们的主要卷册。不要忘了这点:福柯是个批判哲学家。我的意思是,福柯分析制度和

文本,是为了给思想和行动敞开新的空间。他不会规划出一个行动的程序,这样做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他所宣称的:“我的角色——这是一个必须特别强调的词——就是要向人们阐明:人比其感受到的更自由,比那些被当作真理和论据接受下来的东西更自由,比那些在历史上某一时刻被建构起来的主题更自由——这些所谓的证据是可以被批判和摧毁的。(《自我的技术》,第10页)”

影响

作为一个批判思想家,福柯的影响如同其批判的领域一样广泛。像很多参与五月事件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样,1968年的五月事件挫伤了福柯。当时,那些看起来是文化、社会和经济革命在发生前就已终结。起义的理论背景引起了广泛的心理分析式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福柯反抗这些理论,不仅因为它们自视为思想系统,也因为它们不合时宜地嵌进权力关系中。与总体革命相对,福柯对局部化改造的信仰在此得到强化。

马克思

聪明的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对历史处境的强调始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地,思想和行动的类似性也导源于马克思的意识物质性的观点。简要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历史被相互竞争的利益所推动,这些利益竭尽全力要达到对生产方式的控制。马克思认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有产阶级想持久地控制生产方式,而生产